

浅析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发展与变化

马翠婷

(新疆大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吉尔吉斯斯坦的苏维埃政权于1918 年中期建立, 1936年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991年8月31日独立, 成立吉尔吉斯共和国。在这七十年多年, 吉尔吉斯斯坦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章从社会生活和意识观念两个角度, 即从国家规模、法律体制、文化生活、传统观念和生态意识五个方面分析了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发生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总的来说, 尽管在这几十年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占主流, 但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物质条件, 同时, 通过人民的努力, 其民族精神得到了保留、更新和传承。

【关键词】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社会生活; 意识观念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16-00063-06

一、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生活的改变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这一时期, 国家进入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不仅是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进行的, 而且还基于当时独有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由于之前的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俄罗斯, 生产资料和资源的国有化并没有对其产生严重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一时期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的影响较为积极, 因为在这段时期不仅暂停了邻近民族对吉尔吉斯斯坦土地的夺取进程, 还加速了在法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建设。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在因政府更迭而产生的新关系体系中的第一个, 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时刻。

(一)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规模的改变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功推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国家人口高速增长。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增长率方面排名第一, 人口增长了 46.5%, 其中城市人口增长了 220.8%, 农村人口增长了 35.1%。1926年共和国有 66.87 万吉尔吉斯人, 1999年就有超过 300 万, 大约在同一时期, 吉尔吉斯民族人口在共和国总人口中的相对份额也有所增加: 1959 年为 40.5%, 1989 年为 52.4%。除此之外, 正是在这一时期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了城市化进程。1987 年吉尔吉斯人占共和国工业总就业人数的 25%, 尽管这一比例并不高, 但考虑当时人口数量, 这群人对整个国家的文化进程的影响相当明显。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北部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 在南部, 一些农村和边境地区和其他偏远山区的人口增长率最高。除少数老工业城镇外, 城市人口增长显著。随着共和国内人口流动规模的增加, 移民流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当然, 除吉尔吉斯人外, 其他民族群体的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俄罗斯人、

土库曼人、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等等。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新的空间发展格局, 据统计, 有 90 多个民族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生活和工作。

农业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0-80年间, 在共和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农工综合体, 为该国大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 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 1990 年代以前, 农作物生产的主要生产者是公司农场, 几乎占总产值的 45%。

在这七十多年, 吉尔吉斯斯坦被改造为了一个典型的定居式国家, 与游牧国家相比, 它拥有更大的稳定性和力量。

(二)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生活的发展

在未成立苏维埃政权之前, 吉尔吉斯斯坦在人口识字率方面是中亚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人口普遍不识字的情况下, 阅览室成为一切群众性政治、文化和教育工作的中心, 设有扫盲班和课程、图书馆、戏剧团和业余俱乐部, 举办讲座、读报和表演。全日制, 夜大和函授形式的教育机构广泛建立。

大众媒体的创立也始于 1920 年代, 媒体系统每年都在补充新的出版物和传媒手段。到 80 年代中期,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每年出版 113 份报纸和 42 种杂志, 以吉尔吉斯语出版了 61 份报纸和 16 种杂志。此外, 中央报纸和杂志也在该共和国发行出版。1927 年在首都首次出现广播,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吉尔吉斯电台有两个节目。1950 年代后期, 吉尔吉斯斯坦开始播放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电视广播。到 90 年代初, 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内有了电视节目, 在城市能够收看几个节目。当然, 文化和教育机构在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 1990 年共和国统计委员会的资料, 当时的吉尔吉斯斯坦 9 个剧院、33 个博物馆、253 台电影设备、322 个图书馆、163 个俱乐部。

在满足工作吉尔吉斯人的精神需求方面，除了文化环境外，俄罗斯和吉尔吉斯语双语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1989年的人口普查，37%的吉尔吉斯斯坦人能够流利使用俄语，其中超过7000人甚至认为它是母语。通过俄语，吉尔吉斯人已经加入或正在了解、学习世界文化成就。31.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阅读小说，50%的人表示不时阅读小说。46.2%的人更喜欢用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两种语言阅读。

（三）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法律体制的改变

在最后形成了几十个民族并存的独立国家之前，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内部的法律关系以及人民的法律意识和行为对后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尽管社会主义管理和法律形式存在缺陷一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缺陷，但吉尔吉斯斯坦参与了对他们来说全新的文化和法律空间、新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是迈向进步的重要一步。

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在吉尔吉斯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能够自我供给的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其次，国家边界被明确标出，后来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完整边界。最后，苏维埃国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设法消除了不适合，甚至阻碍国家建设的游牧的生活和管理形式。总之，正是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吉尔吉斯斯坦成为真正的和有能力发展的国家的所有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生活形式的建立，所有法律意识的转变过程开始发生。新的法律形式和制度引入到日常生活，然后相对较快和持久地引入公众意识，这比起以前，法律制度更上一层楼。

即使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历史，但过去的社会主义现实仍然影响着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目前对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和法律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最重要因素是共产主义制度和传统社会结构的遗产，以及遗留在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人民的心里意识。至于共产主义遗产，对吉尔吉斯斯坦现代法律体系系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特征点主要有：（1）高度集中化和国家高度参与调节社会进程；（2）权力集中在总统和政府官员手中；（3）议会权力有限，司法机构薄弱；（4）发展不充分的的地方政府。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理尽管有种种缺点，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家长式情结是社会国家法律的一个明显特征，向公民征税，照顾年轻一代，该体系的公民意识继续影响着公民的大众社会经济和法律代表，以至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希望工业和土地保持为国家所有。

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意识观念的变化

民族意识是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美学、哲学、宗教和其他观点的总和，这些观点具有民族发展的内容、水平和特点的特征。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在社会和个人综合因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个人层面上，民族意识受到一定的民族环境、民族文化状况、传统、民族社会地位等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加入苏联后所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精神生活和社会观念的改变和发展。

（一）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

图·乌·乌苏巴利耶夫在自己的著作里写到：“吉尔吉斯斯坦加盟苏联，消除了吉尔吉斯的劳动群众主要受害的部落冲突和民族冲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为意味着克服吉尔吉斯斯坦各个部落的孤立、朝着民族统一迈出的重要一步。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各个加盟共和国从落后的宗法封建制度向更加进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转变。”吉尔吉斯斯坦存在传统的价值观，如部落主义、氏族主义、地方主义及其相应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基本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价值观对国家和民族进步没有贡献，但大多数吉尔吉斯人心理的基于传统部落社会的价值观，专注于自己同类的利益和需求。在以公共利益优先于私人利益为特征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中，集体主义精神和价值观与吉尔吉斯部落关系的传统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原则并不矛盾。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源于欧洲，但受到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欢迎。与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对于吉尔吉斯斯坦部分人口而言，这些改革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痛苦，因为按照当时吉尔吉斯斯坦国情，上层或中产阶级占比并不高。

大约二十年之内，人民改变了生活方式，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和社会阶层和群体，出现了掌握了科学和理论的思维的吉尔吉斯知识分子，国家创建了教育系统、医疗保健、新的公共和政治机构和机构，开始加速发展工业和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除了很好地保持了原有的传统价值外，外来的价值也能很好地生根发芽。正是在苏联时期，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才形成了公民主义的概念和建国的基础。

（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态观念的变化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时期，人民传统的生

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吉尔吉斯人的传统生态意识实际上是绝对神秘主义，这是由于传统社区的个人几乎完全依赖自然，而这又是由于缺乏对于自然过程和规律的可靠和充分的知识以及社会的低生产能力。苏维埃国家通过建立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在教育机构寻求普及扫盲并将有关现实的科学观念引入大众意识的活动的压力下，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先前的生态观念和知识结构崩溃了。

克服了这种观点自然就全面转变了人民的环境意识。对生命构成某种威胁的东西进行神化是没有意义的，特别是当新获得的知识能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自然过程。关于自然过程的知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自然本身的态度。从那时起，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有原先对自然充满敬畏和崇拜之情不断融入自然环境，开始开发自然环境，揭开了大自然神秘和神圣的面纱，以物质为基础的新生态模式无疑在吉尔吉斯斯坦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吉尔吉斯人从是自然有机部分的状态过渡到了它的“主人”状态。因此，吉尔吉斯人的头脑中对于自然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要从外部带来的知识外，在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生活条件逐渐提高和人口数量的急速增加很大程度也影响了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对大自然的态度。

三、结语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尽管受到了重大的外部影响和历史的种种磨难，人民还是设法保留了他们的主要文化和基本遗产。基于自己的语言形成了世界民族图景以及民族心理、气质和精神这样重要的文明元素，他们的语言就是一种证明，因此保留了祖祖辈辈之间的连续性和连接这个民族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与气质的纽带。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生活所有领域的构造都发生了变化，在最短的历史时间里从父权社会转变为具有与该社会相对应的模式和价值基础的工业社会的主权国家。虽然吉尔吉斯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拥有形式上的政治主权，但在这一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地位的所有必要政治、经济和文化先决条件都已建立。创建了能够自我生产的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社会和经济基础，人才培养体系，正式的法律体系被引入，国家知识分子出现，国界被划定等等。最后，创造了必要的文化土壤，吉尔吉斯社会目前需要的许多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许多其他西方血统的积极思想和价值观也在那个时期已经生根落地。因此，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生活与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些

变化渗透到意识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现象。对于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来说，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段历史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影响具有双重性，需要从辩证角度客观理性分析。

参考文献

- [1] Бектанова Айгуль Карибаевна.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ая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Манускрипт, no. 3-1 (65), 2016, pp. 34-37.
- [2] Бейшенова Айсулу Тилековна.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кыргызского этноса в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ериод его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no. 10-3 (64), 2019, pp. 59-64. doi:10.24411/2312-8089-2019-11003
- [3] Карыева Анара Карыевна. "Развитие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тв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Вестник нау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vol. 2, no. 3 (27), 2017, pp. 27-31.
- [4] Урманбетова Ж. К. Культура кыргызов в проекции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 [Текст] / Ж. К. Урманбетова / Отв. род. М. С. Аженов; НАНКР, Ин-т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рава. Бишкек: Илим, 1997. 174 с.
- [5] Юсупов Р. У.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и расселение дунган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Диалог ученых на Великом Шелковом пути: 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 Отв. ред. М. Х. Имазов. - Бишкек, 2002. - 377 с
- [6] 阿斯卡尔·居努斯.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人的文化变迁和族际关系[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3):54-59. DOI: 10.16614/j.cnki.issn1001-733x.2005.03.011.
- [7] 邓浩. 苏维埃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民族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8] 石丽娜. 吉尔吉斯斯坦民族问题与中亚地缘政治[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2007.
- [9] 曲鸿渤. 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政策研究[D]. 黑龙江大学, 2017.
- [10] 石晨叶, 晷涛. 失序的吉尔吉斯——内部撕裂与大国较力中的新国家[J]. 文化纵横, 2010, No. 11(03): 112-118.
- [11] 张琬. 艰难抉择中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政策和思想战略[J]. 现代国际关系, 1994(01): 38-43+51.